

(←上接B1版)

两人一起打工期间，陈妈妈常常把先生叫到他们家吃饭。陈妈妈是宜昌人，结婚后和在长江航运局工作的陈伯伯在武汉安家。她做的菜结合川菜的特点，非常可口，尤其是她自制的泡萝卜、泡包菜，每一块都让人食欲大增。先生第一次在进生家吃饭时，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么美味的家常菜。父母是北方穷乡僻壤乡下人的先生从小以面食为主，突然吃到陈妈妈做的川菜风格的饭菜，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幸福。我想他的幸福感大半来自他在陈妈妈家找到了儿时的家和母爱的感觉。先生从那以后一直到和我结婚，每年都是在陈妈妈家吃的年夜饭。先生最近一次吃陈妈妈做的饭是2014年夏天他回国探亲的时候。那年我不能一同回国，先生从武汉给我的邮件中写道“陈妈妈的饭我从十几岁吃到六十几岁”，他对陈妈妈的感恩之心可见一斑。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后，城里各单位停止雇佣中学生，先生和进生的打工生活戛然而止。因为打工期间结成的友谊，先生和进生自然而然地结伴下放农村。1969年元月9日，先生、进生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作为知青下放到湖北省红安县华河公社华家湾。那时有相当一部分“老三届”中学生不愿意下放，可是先生说那时的他是高高兴兴地去了农村的。原因很简单，两年多以前他曾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而现在不问出身大家都可以平等地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下放农村。头一次受到的平等待遇使他感到未曾体验过的开心。然而，一年半以后，先生因家庭出身再次遭到不平等对待。那时城里各单位陆续到农村来招工，把一批又一批的同学招回城里，偏偏不招我先生。在那个“老子

反动儿混蛋”的年月里，各单位不招他的原因当然就是他的家庭出身。他最终被招回武汉当掏粪工，这在那个年代正是理所当然的事。进生因为工人出身，早早地被召回武汉一家保密厂当工人。在先生一人留在华家湾的那段时间里，进生每星期给他写一封信，那些鼓鼓囊囊的信现在还扎成一捆放在家里书房的柜子里。半年后先生被召回城当天，他第一时间从环卫所门卫室拨打53711这个武汉市公用传呼电话通知进生他的回城。在母亲的催促下，进生立刻把先生接到他们家，为受了半年委屈的先生洗尘接风。然而，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在就业上受歧视，在求学的道路上也受歧视。1975年春先生本来已经被环卫所的老工人推荐上大学，在最后的关口却被江汉区卫生局的吴书记以他“政治上不合格”为由取消了入学资格。先生说，“那是我一生中最为屈辱和绝望的时期”。其实，家庭出身对他更大的打击正在等待着他的。

结婚前我的闺蜜圈里有一套特殊的话语，把有十次以下恋爱经验的男青年叫做“班长”，有十次以上恋爱经验的叫做“排长”。“老实告诉我，你当过班长没有——还是当过排长？”刚开始约会时我也曾用闺蜜的话语问过先生这个问题。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开始久久地凝视着空中。然而凝视之后，他并没有像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那样对舒淇扮演的怨妇倾吐他的罗曼史一部始终，而是蹦出“有过一个”几个字后又陷入让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那时候我们已经相处了一段，他也已经带我去见过陈妈妈。后来我有机会和陈妈妈单独见面，才从老人那里了解到先生那段罗曼史的不幸结局。原来先生有过一个初恋女友，是和先生一同下放的知青，双方的家庭出身都不好，一同被抽调回城时，先生成了掏粪工，她成了扫大街的清洁工。虽然他们相处了五六年，共渡了不少难关，可是她迫于家人的压力在先生被取消上大学资格后与先生分手了，理由不是别的，还是那个该死的先生的家庭出身。话到此处，陈妈妈喃喃自语地说道：“他是个好伢啊——我看着他长大的。”听到陈妈妈自言自语，一瞬间我不知道她是在惋惜前女友和先生的分手还是在劝我不要犯傻重复那个女孩子的错误，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是哪种情况

吧，陈妈妈的话证实了先生既没当过“班长”，也没当过“排长”，充其量不过是个“一帮一”的失败者，这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

照说因家庭出身在招工、上大学和恋爱上一再受挫的他性格会比较阴郁，不再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也不奇怪。然而只要不提那些往事，先生这个人非常阳光，特别喜欢唱歌、朗诵和讲笑话，常常在家里大声朗读自己搜集的好文章段落，有时也唱样板戏里的段子，连我们在美国出生的儿子都不仅喜欢跟他朗读莎士比亚的剧本，还跟他学会了《沙家浜》里《智斗》一场戏。我想，他应该为自己的阳光性格感谢陈妈妈，因为陈妈妈对他的关爱让他这个孤儿的生活里充满了人间的善良与温暖。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陈妈妈是如何关爱我先生的。七十年代初期中国人都很穷。那时候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无非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毛衣。先生一辈子穿的第一件毛衣就是当时每天上班的陈妈妈半夜三点起床到汉口中心百货公司排队买毛线，然后一针一针为他织出来的。前面说过我婚姻里没有婆媳矛盾，其实那也意味着我的孩子没有爷爷奶奶的礼物和压岁钱。然而，陈妈妈对我先生的关爱一直持续到他和我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大大地弥补了没有爷爷奶奶的缺憾。比如我女儿四岁生日时陈妈妈买了两件当时还很稀罕的羽绒服，一件给进生的儿子，一件给我女儿。后来先生来美国留学，我带女儿来美国陪读，搬过很多次家，好多旧东西都处理掉了，唯独女儿的那件红羽绒服作为陈妈妈对他一辈子恩情的见证一直被先生珍藏着。1995年夏天我们来美国后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中国人收入还很低，不像如今这样凡有人情世故都去餐馆。去进生家相聚时，陈妈妈陈伯伯都来看我们。那天又是陈妈妈下厨，做了一大桌极丰盛的川菜。说来也巧，那天碰巧是我的生日。席间为当时场景录像的先生问我：“怎么样，这一大桌菜做你的生日礼物对得起你吧？”听了先生的话，我不仅没有怪他借花献佛，而且真心感到我这个没有婆婆的媳妇比有婆婆的闺蜜们的福气更大。

陈妈妈待我先生这样恩重如山，他是如何报答陈妈妈的呢？也许是从小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我先生在待人接物方面往往差一根筋。比如，他第一次到我家见我父母时居然没有准备任何见面礼，害得我不得不临时随便买了点水果点心，并教他说成是他买的才凑合着让他过了我父母这一关，可想而知他那么多年没有怎么对陈妈妈表示他的感恩戴德。毫无疑问，我心里他对陈妈妈是感激不尽的，可是没有任何表示的感恩和完全不知道感恩又有

什么区别呢？所以我常常不客气地骂他这是臭不懂事。气人的是挨了骂他一声也不吭，大概是承认自己的这个缺点了吧。

说来也怪，来美国后先生的这个缺点突然改了不少。因为托福考了满分先生得到俄亥俄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fellowship。他来美国后的头一个月就寄了一张支票回国，不是给我的，而是给陈妈妈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国，大学教师的工资不过每月70多元人民币，那张30美元的支票当时可以换240元人民币，总算表示了一点他对陈妈妈的心意。以后他陆续不定期地寄支票去，一直持续到2010年。那一年他寄了一百美元，进生收到后来信说：“心情领了，以后不要再寄了。这张支票将不兑成人民币，让我母亲留作纪念”。此外每次回国探亲，先生都买些花旗参、深海鱼油之类的保健品送给陈妈妈。

进入新世纪，七十多岁的陈妈妈听力逐渐下降。虽然进生为她配了助听器，可是因为国内的助听器把周围的噪音也扩大了，陈妈妈不爱用，家里人因此必须大声说话她才能听见，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先生听说了，一直想为陈妈妈配一副高质量的美国助听器。这次轮到我说不了，因为在美国配助听器陈妈妈本人必须来美接受医生诊断后才能量身订制，而他自己询问的结果是老人不愿坐飞机来美国看医生，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先生嘴里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知道他心里总觉得是我舍不得那4~5千美元，直到现在不肯原谅我。

2007年陈伯伯以86岁高龄去世以后，陈妈妈的照顾问题渐渐成为他们家的一个难题。进生家共四姊妹，他是老大，有下岗的弱势群体弟妹。以前四姊妹孩子小的时候，各家都得到了老母亲免费带孩子做饭的好处。后来，下岗的弱势群体家里要打工挣钱，非弱势群体的家里嫌老人在家自己不能像同事那样外出旅游。与此同时，陈妈妈年事越来越高，有时健康不免出现状况，不仅不能为各家帮忙，往往成为负担，加之老人在各子女家里的时间长短不一，引起媳妇女婿的不满，几个姊妹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前几年开始，有传说他们考虑将陈妈妈送养老院。听到这个消息，先生心里很不好受。他给进生发邮件时说了“再过十几年，咱们自己就会处于现在陈妈妈的境地”、“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类的话。先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心中也许有自己父母悲惨的晚年和他没有对自己父母尽孝的愧疚，可这些话传到进生姊妹那里，听起来就有批评他们的意思。我提醒先生说：“他们姊妹中任何一人呛你一句——‘你是谁呀，陈家的事要你来管？’——你怎么应对啊？”先生听了我的话哑口无言。于是他就开始郁闷起来。

(下接第B3版→)

